

碑志文研究的新收获

——评《碑志通论》

郭俐兵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DOI:10.32629/jief.v2i1.421

[摘要] 《碑志通论》突破传统的断代视角,其通而论之,文史结合,系统梳理中华碑志文的起源流变和发展过程,就其功能定位、文体特征、写作方式等进行重点论述。行文旁征博引,论述到位,在碑志文的传承与创新、创作与批判方面有着独到见解。书作整体内容丰富、结构合理,文笔生动,分析确切,具有一定的理论思辨精神和学术创新价值。

[关键词] 《碑志通论》; 文学本位; 文化观照; 文体革新

碑志文作为我国古代一种重要文体,近年来成为研究热点。201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徐海容著的《唐代碑志文研究》,填补了学界对唐代碑志文进行综合研究的空白,出版后颇受好评。2019年,徐海容新著《碑志通论》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在这部专著中,作者以文史结合、实例论证的方法,对中国碑志文的发展流变作了整体的梳理,就碑志文创作过程中一些问题进行了厘清,特别是其通而论之,以大历史的视角关注碑志文的千年演进,将碑志的发展与文学革新、文化传承及时代政治变化结合起来,追求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整体而言,书作内容丰富,论证扎实,新见迭出,可谓碑志文研究领域的新收获,具有相当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价值。

1 碑志研究的系统性

中华碑志,源远流长。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其秦汉起就有了立碑作文的传统,此后魏晋时,墓志铭又兴起,使得碑志文创作进入高潮。刘勰《文心雕龙》专列《诔碑》一节,足见对碑志文的重视程度。历朝历代碑志政策或禁或放多有变化,这就使得碑志创作也多有起伏。学界现有碑志研究成果,就专著而言,多专注于断代研究而不及其余。如黄金明《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魏宏利《北朝碑志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李贵银《唐前碑志文研究》(辽海出版社,2016年版),这些专著的问世,都集中于碑志某一时代的发展演变,探讨研究,自有精当之处,但对碑志文在千年文学史中的整体性发展流变,则囿于篇幅或思路,无法论证。《碑志通论》打破时段局限,采取通而论之的手法,将碑志文置身于中国文化的漫长发展流变中,以大历史的视角,审视中华碑志自秦汉至元明清的起源、传承与演进,较传统研究思路,有所突破。全书分为八个章节,第一章“碑者,悲也”,论述秦汉以来碑志的起源和兴起,第二章“勒石赞勋,树碑述亡”,探讨历朝历代碑志政策的变革,第三章“风雅兴寄,明道明人”,就唐宋以来碑志文体的传承与革新进行详细论证,第四章“盖棺论定,慎终追远”,追寻分析碑志文创作的基本规律,就其思想内容和行文体例作出探究。第五章、第六章,以中国古代名人名碑为例,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就碑志文创作前后的动人故事展开论述,揭示碑志文蕴含的时代精神和文化背景。第七章“真真假假,由人由己”,就历代碑志写作的成文方式作了说明,特别是针对碑志文发展史上的诋墓流弊作了整体剖析,第八章则总结分析,对碑志的家国情怀与文化精神进行分析论证。

和同类著作相比较,这种通而论之的手法,观察问题采用大历史观,

系统分析中华碑志上千年的发展史,视角宏大,延伸丰富,将碑志文的发展置于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注重历朝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对比与衔接,从中展现碑志文发展的复杂历程和不竭动力,追寻从秦汉到元明清中华碑志绵延发展的基因与动力。这种融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位一体的通论手法,在论述的深度密度和广度上更为精准,避免了断代式论述的不足,注重挖掘碑志文创作的内在连贯性,注重分析碑刻文化的历史承继性,在述写论证上更显丰富深刻。比如第二章以碑志书写的生命价值为中心,第一节上追秦汉,下至民国,从三不朽的文化精神论及汉末碑志创作的兴盛,第二节则系统论述历朝历代碑志政策的变化,厘清了中华碑志发展史上的禁碑、毁碑问题,第三节则以上官婉儿、李白、唐伯虎和王国维为例,分析不同时期文人碑志书写的生命精神与文化心理。而在第三章中,专门论述碑志发展史上的文体改革问题,涉及到碑志文体的发展定型和唐宋文化转型与碑志革新诸方面。对此作者观察和分析问题都采用一以贯之的大文化史观,以千年文章学史为视域,系统分析,既坚持碑志文的历时性传承性,又注重其在某一时段的独特性,借此揭示碑志演变与文学演变、生命价值演变的关系。

作者认为“碑志文以人为中心,是与人的生命结合最为紧密的一种文体……唐宋以来,中国历史经历了一个‘文化—文学—文章—碑志’的转型过程”,这种强调系统性、历时性的文化关照,将碑志文始终看作一种变动的问题形态,既有利于揭示其创作与革新的基本规律,又揭示出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质和风貌。就内容结构而言,书作的八章虽各有侧重,每一章既有着独立的意义,同时又前后勾连贯通,连缀成一部完整的著作,达到了“通论”的效果。当然,在整体的通论之中又不断出现闪光点,每个章节中都有著者独到的创获,这就较好地做到了点面结合,体现出碑志研究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2 文化研究的整合性

文学是入学,碑志文是生命的回顾和总结,记录着死者的经历,寄托着写者的情感。其描写内容固然以个体为主,但又离不开社会生活及历史现实等大环境的制约,文人创作碑志文的过程,其实也是感知自我生命的过程。一篇碑志的成文,往往有奉诏撰写、应请撰写及自主撰写等多种方式,其文化意蕴是厚重的,反映出碑志作者复杂的创作心理和文化性格。书作第二章“勒石赞勋,树碑述亡”,论述墓碑文对于彰显个体生命价值的意义。无论是从“三不朽”价值观念的影响,或是从碑志文和史传互补互证的效果,还是从碑志文本身扬善隐恶的写作技巧而言,作者都立足于

生命关怀来论述碑志文的价值和影响,这是对碑志文所承载的文化精神的深层剖析。

碑志文以描写生命为基准,而生命世界本身是丰富的多层次的。在解读碑志文如何从冰冷的文字转化为逝去生命的多彩故事时,作者注重从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入手,对碑志文创作前后的背景作了叙述,追求文化研究的整合性。如第五章对写者创作时的“有我”与“无我”的情感把握,第六章通过具体的碑志例证演绎写者与逝者的复杂关系;第七章对于碑志文谥墓现象的深层揭示等,都发掘碑志作者本身的思想感情、社会认知和生命感悟,可以说,书作后几章都是以碑志作者的创作思想和文化心理为核心进行论述的。而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将作家个案研究置身于碑志文发展的整个历史演变过程中,放在同时代、不同时代的碑志作家作品中进行比较研究,因而研究对象是立体的非扁平的、系统的非独立的、动态的非静止的,这在关于韩愈、欧阳修等人的章节中体现明显。同时书作的撰写也非常注意寻找中华传统文化的文脉因子,如第七章中以中国传统文化“逝者为尊”的思想去分析碑志文长期以来的谥墓流弊,第八章论述碑志文的家国情怀和文化精神等等,都广为溯源。这种大文化的视野使得论证既深入浅出,又微言大义。

当然,这种生命关怀和文化观照并不只是集中存现于某一个章节中,在整部书作中随处可见,如前面几章介绍墓碑衍生时,写到“(墓碑)在外形上有一种沟通天人的神秘感,使用碑志这一话语资源和文体形式,也就意味着与上古的生命观念和礼仪传统达成某种连接。”而墓碑的外观是碑头、各身和底座的结构“代表着天上、人间、地下的三界通连,象征着灵魂不死”等等。著者将文化的解读浑溶于无形,以细节论证的方式阐述碑志文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质。比如第六章“备极哀荣,人情不免”中,作者对碑志书写中出现的名人效应现象特别关注。碑志文求者与写者之间关系多元,常出现“一文赢得千古名,借名人之文而成名”的现象。官方也会考虑到逝者与写者的地位名声相匹配,常诏令名士为名臣作碑文,如张说之于姚崇、宋璟等,其余如韩愈、欧阳修等也多奉命撰文。碑志文创作史上还有个显著现象就是逝者与写者的关系多师生、故旧、同僚等,如杜甫之于元稹、白居易之于李商隐、欧阳修之于苏轼、苏轼之于苏辙、蒋士铨之于袁枚、袁枚之于姚鼐、黄遵宪之于梁启超、吴昌硕之于陈三立、陈寅恪之于王国维等,都演绎了名人名文、名垂千古之笔。作者对这一文化现象的剖析,没有停留在简单讲故事的基础上,而是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和时代文风,坚持将文化演变视为文学创作嬗变的主要动因,包括碑刻制度、政治运动、文体革新等各方面状况,在此基础上探寻碑志作家的创作心理和生命意识、价值观念,力求对碑志文体的特质和社会文化内涵做出深刻揭示和分析。这种融宏观和微观为一体的方式,将碑志文的具体创作和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相结合,使得观照视角更为广阔而精细,体现出一种让碑志研究回归文化研究的思路,具有相当的整合性。

3 文史研究的本位性

文史研究应该坚持文史本位,即重点关注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灵活动,这种研究视角不仅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开启了广阔的驰骋空间,也对古代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文本细读变得更为重要,因为生活就藏在细节中,心灵就藏在细节中。中国古代文学,以至所有的文字书写,都有粉饰、伪饰的习惯,不太直接、准确揭示生活和心灵的真相。研究者必须分析、揭示这种伪饰下的真相,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正是这种研究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就思想内容而言,书作显然追求文史研究的本位回归,追求作品的细节解读和作家本人的心灵探析。第一章对“碑者,悲也”碑刻观念的梳理,第二章对于“树碑述亡”写作传统的分析,特别是第三章对于碑志文写作中文道关系的论述,第四章对于碑志书写规律的辨析,都体现出强烈的文史互证的精神。如论述上官婉儿之死时,作者通过新旧《唐书》上官婉儿本传与新出土的《大唐故昭容上官氏墓志铭并序》的文本细读,反复对比,逐一列举出墓志与史传所载上官婉儿的异同之处,力求对千古迷案进行剖析。而在论证碑志与史传的区别时,作者以碑志大家蔡邕和张说的碑志文为例,就其所写墓主与史传所载墓主进行重点对比,又联系王行所论碑志书写的“十三例”,最终对碑志与史传的区别作了评判,指出碑志书写中“事定犹须待阖棺”的重要性。这种资料细读、文史互证的方法在其余的第六、第七、第八章中亦多有体现。如对碑志文谥墓流弊的分析,对韩愈撰写《平淮西碑》前后经过的述写,对欧阳修撰《尹师鲁墓志》和《范仲淹神道碑铭》风波的解读等,都通过大量文史考据来解析作家的心灵世界,还原作品创作的具体场景,追求历史实证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研究思路。

当然,这种文史本位的思路还体现在书作的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历史文献资料、理论探讨和作品文本分析三结合的方法。一切凭材料说话,在充分解读材料的基础上,筛选对比,精心论证,既有对碑志文发展的整体理论阐述,又有对具体作家的具体分析,使得立论更有说服力。其二,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书作几乎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要论证和解决的中心问题,由此生发,点面结合,以点带面,引出碑志文创作批评的普遍问题。而在具体的小节中,著者又很注意去考察和辨析学界有争议问题,并提出个人新见,如第五章提出碑志书写的“李白现象”,第七章对碑志书写“真真假假,由人由己”的尺度把握等。其三,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作者将碑志文的起源演变置身于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以及中国文学整体的发展流变中,将碑志书写置身于人的生命世界中,多层次多角度看待问题,避免平面论述,综合运用金石学、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研究方法,这种大文化的研究视角也值得借鉴。

就语言风格而言,《碑志通论》也有可道之处。在严谨的论证之余,作者以清新生动的文笔,流畅优美的句式,对碑志书写的前后故事进行娓娓道来,宛若别致的花絮,这在论述碑志书写的有我无我、碑志书写的名人效应和碑志的家国情怀与文化精神时表现明显。当然,毋庸讳言,书作不足之处也很突出,如部分章节略显粗糙,且引文多赏析多而理论分析少,深入论证不足;通论而论,唐宋多而其他时段少,个别字句需待修正等。整体而言,瑕不掩瑜,书作基本做到了融博雅与通俗一炉,具有相当的学术普及性。希望作者在以后的研究中,谦虚谨慎,精益求精,有新的优秀成果奉献学界。

[参考文献]

- [1]吕冠南.碑志文献与方志著作中的辽金佚诗[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9,33(04):103-107.
- [2]张恨雨.文章学视域中的唐代碑志——评《唐代碑志文研究》[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9,33(05):88-92.
- [3]李雪.由碑志资料看元代色目人的士人化进程[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02):128-135.

作者简介:郭俐兵(1987-),女,汉族,河北邢台人,华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后,研究方向:古代文学。